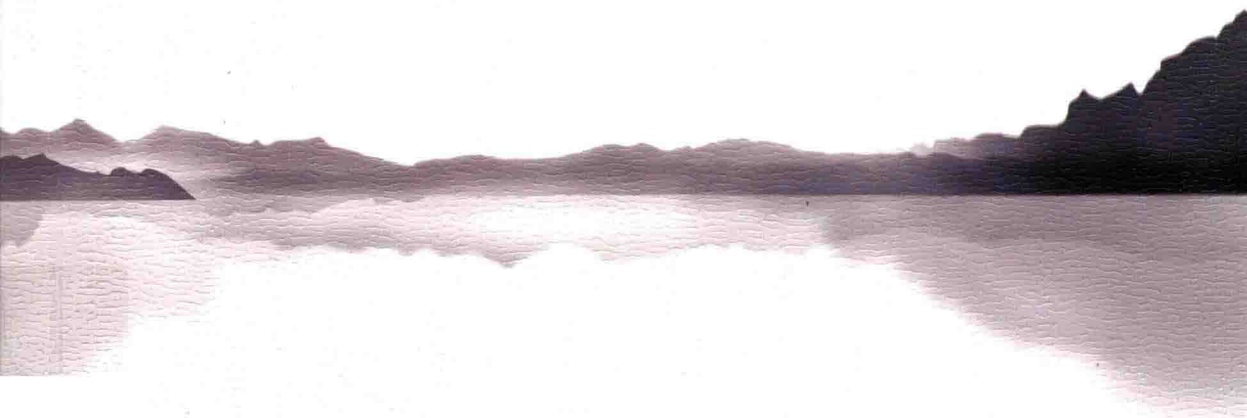


从海外看中国

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an overseas Chinese

韩东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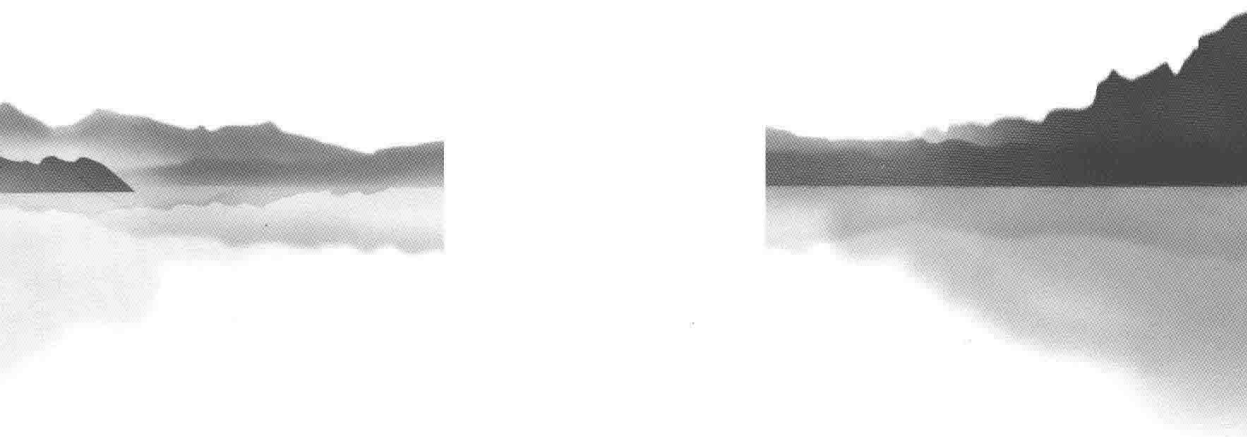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海外看中国

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an overseas Chinese

韩东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 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

《河北大学世界史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全球化的日趋深入，为我国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进国际资本和智力提供了广泛渠道，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快速提升。同时，在中外日益频繁的友好交流、积极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贸易摩擦、领土争端、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对抗也时有发生。现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学习和研究世界历史，可以探寻解决问题的智慧。也正基于此，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以期通过此举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

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底蕴深厚，名家云集，具有悠久的世界史研究传统。方豪、齐思和、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都曾在河北大学从事过世界史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世界史学科引进了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教师，壮大了师资队伍，逐渐形成了一支梯队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拉美史、欧洲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等区域研究特色。

为将研究成果社会化，经过学院充分的酝酿与筹备，特推出河北大学《世界史研究丛书》。该丛书旨趣在于：纵向上贯通古今，洋为中用，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横向上，汲取不同民族的智慧，探究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序 言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学。像许多农家孩子一样，上学前我每天有干不完的活：放羊、挖野菜、捡柴火、拾煤渣、挑水、推磨、做饭、刷锅洗碗等。上学后，放了学也得干这些活。稍大一点时，就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几年下来，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我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也像许多农村孩子一样，我从来没有什麼远大理想，只是想当个好农民。别人说农村苦，但我觉得当农民很好，有很多自由。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就是在农村度过的。当年搞集体经济，农民基本上是无忧无虑，不愁吃不愁穿，至少在我的山东老家是这样。我们从生产队分到各种各样的粮食，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还有柴草。逢年过节，生产队里还分肉、分鱼。到年底，生产队根据每家工分多少还分红。从我高中毕业后，我们家每年都从生产队分到三百元以上的现金，日子过得很富足。

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带着试试看的想法参加了高考，没想到成了那年我们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刚上大学时，跟班上那些城里来的教授子女、干部子女相比，我的水平差得太多。同学当中有人在大学进修过四年，有人教过十年英语。而我的英语知识也就是认识几个简单的单词而已。由于来自胶东地区，口音重，我一张口同学们就会笑。老师给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同学额

外辅导发音，还给我们指定水平高的同学当课外辅导。没想到就我这样一个曲阜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蹩脚学生，成了我们大学建校后第一个考上本专业研究生的学生。

在河北大学读了三年英语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了郑州大学外语系教书。教了三年翻译，我考取了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一年，然后又考取美国佛蒙特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获得历史系硕士学位后，又到布朗戴斯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国外，我写了几篇短文，发表在纽约的华人报纸上，不知如何传到了国内。有关部门请我回国工作。但我在回答听众问题时，直来直去，请我回去的人认为我在国外更合适一些。于是我就又重新出国。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最初到美国的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教书。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当时有两万七千多在校学生。我每个学期教三门课，多是必修课。大班授课，通常有一二百人。学生来听课不是因为喜欢这门课，而是不得已。他们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我从来也不知道谁来了，谁没来。

小班只有三十来个人。这些都是政治系的学生。他们来听课都是因喜欢这门课才来的。课上起来就有意思多了。但是我无意中得罪了系主任，把工作给丢了。那时候，系主任和资深的同事每个学期都得来听一次课。然后给你提出建议，帮你成为好老师。他们的评语就放进新老师的教学档案里。有一次系主任来听我的课，时间是十二点到一点。系主任是个60多岁的老头，他在课堂上睡过去了。对这事我并没有太在意。下了课往回走的时候碰上系主任的老婆，也是我的同事。她问我今天的课讲得怎么样？我说课上得很好，但系主任睡过去了。我只是自我解嘲，当笑话一讲。但系主任的老婆告诉他后，他却生气了，因为他的做

法是失职的，这让他很丢面子。

后来，我邀请韩丁到我们学校演讲。他在美国大名鼎鼎，他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翻身》被译成十四种语言，售出七百多万册。美国大学关于中国政治的课，都用他的书做教材。韩丁演讲的时候批评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结果让校长、院长很生气，中途就打断了韩丁的演讲。我当时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就是校长不喜欢韩丁的演讲嘛。但是系主任利用这件事，把我的位置给取消了。于是我就只好重新找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个坏事变好事的转折点。如果他们不取消我的工作，我可能就一辈子待在美国的中西部了。因为有了工作，我不得不重新找容身之处，找到了我现在教书的地方——华伦威尔逊学院。这所大学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教育哲学跟我个人的教育理念相吻合。在这里教书我可以畅所欲言。我的授课也很受学生欢迎。每年夏天我还可以带一些学生回中国访学。

我们学校的校园面积很大，占地七千二百多亩。学校拥有一个四十多亩的菜园和一个两千多亩的农场，场内养着猪、牛、羊、鸡，还种了很多粮食。学校给教职工提供取暖的木头，还有免费的牛奶。可以购买学校以传统有机的方式出产的牛肉、羊肉、猪肉和鸡蛋。我家有六亩地的院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我可以种菜，种粮食，还可以从学校买回猪、羊、鸡，自己宰杀。就这样，我在美国实现了我的中国耕读理想。

当年准备到这所学校求职试讲的时候，我在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一位上海来的同事加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千万不要说我业余时间会种菜、杀猪之类的事，这些都登不了大雅之堂。像他自己会弹钢琴，谈谈无伤大雅。我的那些农民爱好，最好不要让人

知道。但是电话上人家问起我的业余爱好时，我忘了朋友的嘱咐，还是把自己的农民爱好说了出来。没想到对方知道我会杀猪、种菜，很是惊奇，居然问我能不能以后教他杀猪，本来朋友建议遮掩、隐瞒的东西，还帮了我的大忙。我说不清这些农民爱好究竟帮了我多大的忙，但我深信当年在农村的时候长辈所说的话，艺不压身，任何知识和技能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派上用场。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东西，是我在美国读书、教书与研究的心得，大都跟中国有关系，是我身在异国对自己祖国的观察和反思。好多在美国和中国的一些期刊发表过，结集在这里，希望能对读到它的人有所启迪。

韩东屏

二零一六年一月于美国北卡爱什维尔

目 录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	(1)
论反毛者的逻辑	(17)
1977 年高考经历	(23)
户口制度与中国农村发展	(32)
亲历：达赖喇嘛的多面性和西藏问题的复杂性	(58)
中、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比较研究	(71)
从一家中国餐馆打官司的经历看美国的司法制度	(87)
美国的农业与美国的社会危机	(103)
中情局	
——美国全球霸权的双刃剑	(118)
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思考：历史视野中的中美全球战略	
博弈	(124)
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简介	(138)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

一 毛泽东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

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我应邀到纽约的汉特大学演讲，题目是“我心中的毛泽东：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毛泽东”。演讲结束后，纽约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问我怎样解释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我回答说，历经苦难与压迫的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和崇拜，完全是出于他们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伟大领袖的由衷敬仰。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是一种无端的污蔑。美国人崇拜他们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小学课本里有少年华盛顿的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用父亲给他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心爱的、当地稀有的一棵樱桃树，父亲追问他的时候，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犯的过错，受到了父亲的原谅和赞扬。这样一件孩提时的平常事，被拿来宣扬领袖的品质，这是为什么？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总司令，但他曾两次威胁说，如果不及时给他发军饷，他将罢战回家。其实，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富兰克林通过外交斡旋，使法军卷入英、美之间的战争，英军获胜无望，才被迫让美国独立的。而美国人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华盛顿，这叫什么？美国人还崇拜林肯，把他看作是解放黑奴的总统，但林肯没有给美国黑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只是给了他们名义上的自由。林肯在一封信中说，养猪有不

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给猪盖猪舍，提供食物，另一种方法是让猪自己找食物，如果猪冻死，饿死，正好烤着吃。信中暗喻的对象是谁？体现了对黑人最起码的尊重了吗？美国黑人被“解放”后，仍旧流离失所，逃不脱被奴役的命运。林肯真正值得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崇拜吗？美国人崇拜肯尼迪，但肯尼迪为美国人民做了什么呢？他的一句话：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就让美国人对他的崇拜不已！如果说个人崇拜，美国才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1988年，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们正在搞一场丑化毛泽东的运动。他们骂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骂毛泽东是秦始皇。许多新加坡的老华侨对此很反感，他们对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非常热爱。冷战时期的新加坡政府是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数次欲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但每次都没能得逞。新加坡的老华侨为了支持新中国，排队到中国银行去存款。他们没有多少钱，三元、五元，连续数日，银行不得不加班加点营业。新加坡政府看到新中国是人心所向，不得不收回关闭中国银行的成命。一位新加坡中国银行的高级官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是新加坡老百姓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挚爱和支持，才保住了新中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当时新加坡政府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新加坡中国银行的职员，为了让新加坡人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有一个向毛泽东主席致哀的场所，自发地在新中行营业大厅搭建了一个灵堂，原计划开放三天。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新加坡老华侨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新中行，向毛泽东主席遗像致哀，三天时间根本不够。新中行的员工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开放毛泽东主席的灵堂，并将开

放时间延长至十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华侨哭倒在毛泽东主席的灵前，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打着用各种语言写的，意思为“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的横幅，到新中行临时搭建的毛主席灵堂，向其遗像致哀。新加坡中国银行前副总经理蔡剑秋先生手里仍保留着几百幅当年拍下的照片。那时，他只是新加坡中国银行的一名低级员工。在海外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让我深深地感到，那些谩骂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人实在是无知与肤浅。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和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从根本上讲，代表的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得到中国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热爱与崇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些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想让人民崇拜？只是自己制定的政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无法让自己得到人民的崇拜。如果说毛泽东生前，人民热爱崇敬他，可能跟政府的宣传有关系，或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毛泽东去世后，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及其精英，动用了他们所掌握的舆论机器，使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大肆诋毁毛泽东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再把受压迫者对毛泽东由衷的、执着的爱，说成是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就不合逻辑、荒谬绝伦了。

本人在美国参与了揭露蓝登公司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之内幕的活动，了解到许多美国政客为诋毁毛泽东主席所做的无耻勾当。蓝登公司出资五十万美元，买下了李志绥的版权，然后又重新组织写作班子，炮制出一部漏洞百出的破烂货。李志绥用中文写的书，结果封皮上居然出现中文翻译的名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参与了李志绥回忆录的炮制，并亲自为“李志绥的书”作序。毛泽东去世后以中、英文出版的诋毁毛泽东的书不计其数。湖南人梁恒与其美国妻子夏竹丽

(Judith Shapiro) 合著的《革命之子》、高原出版的《自来红》、张戎的《野天鹅》等，都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团漆黑，但这些都像狂犬吠日一样，丝毫无损毛泽东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形象。

20 世纪 90 年代，正当精英们大肆诋毁毛泽东的时候，民间却盛行着毛泽东热。美国《纽约时报》多次发文讨论这种现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一个叫李非根的学者要求采访我，说要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热的电影。李非根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客观的学者，曾在他的书中引用我书中的话语、观点十几次，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到采访那天，他先付给了我一美元，然后递给我一份合同，上面写着，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接受李非根的采访。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李非根编辑我的话语，断章取义我的话语，歪曲我的话语，糟蹋我的话语，我理所当然地拒绝签署这样的合同。但李非根说这不是他的发明，美国的许多出版社、电视台都用类似的合同来保护自己。同时，他又拿出几份别人已经签过的同样的合同让我看。我想既然这是惯例，也就把合同签了。他采访了我两个小时，但后来电影发行时，简直让我看不下去。^①由此可见，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是美国一些不良出版商的惯常做法。

二 毛泽东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被奴役、被欺凌。毛泽东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己任，与他的同志们艰苦奋斗 28 年，于 1949 年，建立了人民当

^① Lee Feigon, *The Passion of the Mao*, March, 2006, U. S. A.

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把西方势力彻底赶出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毛泽东力排众议，毅然出兵朝鲜，把逼近中国边境的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毛泽东以战止战，彻底结束了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杀戮抢劫的历史。

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鼓舞、支持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旋律风靡 20 世纪 50、60 和 70 年代，在此期间，大批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开始走下坡路。法国殖民统治者被越南人民赶出印度支那，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英国被迫放弃其殖民地王国地位，美国继在朝鲜失败以后，又在越南惨败。美帝国主义陷入一个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圈定的尴尬境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被彻底改变。

2000 年，美国《生活》杂志聘请 24 位世界著名学者，挑选在一千年中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位历史人物和一百件重大事件，毛泽东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主席领导的长征也被选为一千年中的大事件之一。

我在美国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后到中国教英文多年，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一个中国男人，并与之结婚生子。2013 年夏天，我到她教书的地方呼和浩特市去看她。她告诉我，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她，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打败美国和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她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却看不到。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当年看到了，特别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与被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的不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

上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极大地鼓舞了许多海外华人。当年，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大气候是有很大大关系的。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跟中国在朝鲜的胜利分不开的。今天，许多中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被领取美国政府津贴的“中国精英公知”蒙蔽了，甚至洗脑了。

三 毛泽东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国许多不良文人说毛泽东时代不民主，因为没有所谓的普选，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到美国来以前，我也曾认同过这种说法。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后，研究了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我才明白毛泽东主席实行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干部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波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看了我介绍“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员会的老、中、青和工、农、兵三结合的人员组成后评论说，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军人组成政府，并直接管理国家，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democracy in spade），因为由工人、农民和军人组成的政府，是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兵以及其他基层民众利益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大多是钱多势大的人，真正出身工、农的政客是凤毛麟角。在美国和西方参加选举需要大量金钱，没有金钱开路，真正的工、农要进入政界十分艰难。所以，西方的所谓选举，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的一场游戏。美国虽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有所牵制，但在维护精英阶级的利

益上，他们总是一致的。2000年和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高和约翰凯利明知共和党作弊，也不愿与共和党苦争，以便不把船弄翻，因为只要船不翻，双方可以继续高高在上，过精英生活。这边的损失，可以在那边得到补偿。

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是由精英阶级把持着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美国，竟有七分之一的人（约4500万人）在饿肚子，没有医疗保险。在许多人眼里，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典范，但只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关押着占世界25%的监狱人口。每9个年轻美国黑人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70%的美国黑人一生中至少坐过一次监狱。在美国的纽约州，每年有60多万美国人，大部分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被警察拦住并搜身，其中有近20%的人因为不配合，被以拒捕的名义逮捕。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就被警察叫停搜身，还得配合警察，如不配合，就要被逮捕，这是多么荒唐的民主制度！但美国所谓的自由媒体从来就不讨论这个问题。^①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除此之外，美国的各地拘留所里，每年还关着一千万等待审判的罪犯，许多只是犯了小罪，但交不起保释金的穷人。

在毛泽东时代，许多工人、农民进入了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50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倪志福、郝建秀、时传祥等一批工人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更成了各级人民政府的主流。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书读的不多，但他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是领导农业的好人选。只有

^① Noam Chomsky, *The U. S. Behaves Nothing Like a Democracy, But You'll Never Hear about it in Our "Free Press"*, Altnet, August 15, 2013.

在毛泽东时代，陈永贵这样的农民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在陈永贵主持农业的时候，彻底改变了面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使中国的农村水利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粮食产量上了好几个台阶，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寿命能从1952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9岁，超出条件跟中国差不多的印度20岁，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时代选拔工、农、兵干部，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军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与西方的精英民主相比，这个政治制度能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更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更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民，积极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他们以各种形式批评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民意基础。毛泽东时代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创意的民主制度，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清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是许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赞许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大选时，勉强只有一半的人参加投票，大部分美国穷人对选举无动于衷。地方选举投票的人更是少得可怜，我所在的城市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时，投票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而政府为筹划选举花了很多钱，平均在一张选票上耗费一百多美元。当地的报纸采访我，问我这样的选举值不值得。我只